

一 生平與治學



家世、出身

1936年2月15日，出生於江蘇省興化縣的戴家窯。這是一個以燒製磚瓦為主業的新興小鎮。父親楊炳存，原為東臺縣廉貽鄉北莊人，世代務農。早年參加過清政府的科舉考試。民國時期，因朋友介紹，到江西入仕，改名“政南”，管理兵營，擔任過“南昌兵站主任”。抗戰爆發，戴家窯所租房屋被日機炸毀，另建新居。當時，戴家窯歸屬興化還是東臺，發生爭論。父親得到當時國民黨的地下抗日武裝——長江下游挺進軍的支持，出任汪偽戴家窯區等地的區長，挺進軍並派人到我父親身邊擔任秘書。該人後被汪偽政權拘捕，父親還曾到興化縣設法營救。父親辭去偽職後，挺進軍還曾續聘父親為“募捐委員”。抗戰勝利後，父親改名“退安”。新中國建立後，一度改業糧店，最後從業中醫。

父親初娶丁氏，育四女。繼娶張氏朋女，無所出。再娶施耐庵故鄉白駒之陳氏。1936年生出敝人，父親時已五十五歲。古代南齊的詩人徐陵因少年穎慧，有“天上石麒麟”之譽，父親以此為我取名“天石”。又傳說古代彭祖“年長八百，綿壽永世”，父親又為我另行取名“彭庚”，小名“長齡”，希望我聰明、長壽。為了求取佛祖保佑，父親還將我的姓名、生辰，寫成字條，置於東臺縣西溪鎮廟裡的菩薩座下。

我幼年時參加過下地勞動。父親是地主，一生中陸續增地至三處，約一百二十畝。大概始終屬中小地主之列。新中國第一次普選時，父親即獲得公民權。1973年九十三歲時善終於無錫。不過，他的成分和經歷卻給我帶來過很多麻煩和困擾。1949年4月，無錫解放，我於當

年 12 月即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前身），先後擔任過支部書記、總支書記兼團委委員等職務，甚至曾被派進無錫市委的黨員學習班培訓，但我一輩子只是個無黨派人士。



無錫一中百年大慶典禮致詞

主席，各位領導，各位嘉賓，胡校長，各位老師，各位校友，各位在校的弟弟妹妹們，大家好！

昨天，我在北京機場準備登機回無錫來的時候，接到胡校長的電話，說是校慶典禮上原來準備講話的一位校友身體不好，要我替補，代表全體校友講幾句話。事出突然，我完全沒有準備，但是，老師的話不能不聽，我只能應允。

講什麼呢？我是 1955 年畢業，離開市一中，去北京大學讀書的。2005 年，我們那一屆畢業的同學相約聚會一中。當時，我曾經寫過一首小詩，不長，只有十二句，是一首五言古體詩，題目叫《同學會》。這次校慶，我再次回校，見到許多老同學，其情其景，和 2005 年的那次聚會頗有相像之處，我願意藉這個機會，將那首小詩介紹給大家：

分手五十載，相約母校行。

這兩句是說：同學間分別五十年了，大家相約聚會母校。

依稀辨舊貌，恍惚憶姓名。

這兩句是說：當時翩翩年少，而今均已古稀，面貌變化很大，陌路相逢，可能互不相識，不敢相認，但是，相逢之後，總能從言談笑語之

間，依稀找到年輕時代熟悉的面影。

白首驚相看，鄉音滿耳盈。

這兩句是說：當時黑髮烏絲，而今彼此相看，都已白髮滿頭；一堂之內，一群白頭老人相聚，充盈耳際的是不變的鄉音，地地道道的無錫話、無錫腔。

外號脫口叫，趣事說來清。

這兩句是說：分別日久，有的人的名字，可能想不起來了，但是，當年彼此戲稱的外號卻會脫口而出；許多記憶，被歲月的波濤沖刷了，但是，某些有趣的小事卻可能記得清清楚楚，如在昨天。

青春報國志，垂老天下情。

這兩句是說：當時青春年少，“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立志將自己的青春報效祖國、報效人民；如今垂垂老矣，仍然胸懷世界，心繫天下。

絮談夜繼日，不覺又天明。

這兩句是說：五十年了，人生有幾個五十年？五十年的相離、相聚，自然無限興奮，也無限感慨；彼此間有說不完的話，白天說不完，晚上接著說，不知不覺，已經是第二天早晨了。

這首詩所寫的是五十年不見的老同學們相見時的情景。我這裡想著重強調的是其中的兩句：“青春報國志，垂老天下情。”是誰在我們青

春年少的時候，就培養我們立志報國，服務人民，到了垂垂老年的時候還胸懷世界，心繫天下？自然，是我們敬愛的母校——無錫市第一中學。

我們這些人進入無錫市第一中學的時候，或者是初中生，十三四歲；或者是高中生，十五六歲。正是長身體、長知識，形成人生觀、世界觀的時候，也是所知甚少，各方面都很淺薄、很幼稚的時候。那時的我們，宛如一株小樹苗，正待雨露灌溉，陽光沐浴。是母校，我們敬愛的母校，如雨露陽光，灌溉我們，沐浴我們，培養我們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讓我們立志一輩子報效祖國，服務人民，振興中華，立志一輩子為人類造福，為世界的進步、發展奮鬥；也是母校，我們敬愛的母校，為我們打開了知識大門，誘發了我們對科學的興趣，給了我們進入各門科學的堂奧，或者進入社會所必需的各種知識和技能。可以說，沒有母校，就沒有我們的正確人生；沒有母校，我們就沒有可能進一步掌握為祖國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各種技能和本領。我們在離開學校以後的漫長歲月裡，不論在什麼崗位上，大家都為祖國、為人民做出了這樣、那樣的貢獻。各人的貢獻可能有大有小，但是，所有這些貢獻，都和我們的母校、和在母校工作的老師們的辛勤勞動密不可分。

至今我還記得，那高高瘦瘦的錢鍾夏和永遠眯著眼睛微笑的黃宗憲兩位校長，記得矮矮的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口若懸河，講起話來頭頭是道的李谷村教導主任，記得那像慈母一樣關心我們、愛護我們的班主任李進化，記得微微發胖、鬢髮花白的數學名師錢淵如，記得板書清秀工整、臉上線條如刀削一般的物理名師潘驥，記得每個週六一定拿著一把雨傘回到無錫鄉下探親的歷史課教師周守信，以及經常西裝革履、素以嚴格著稱的語文名師何阡陌。我想，我們每個校友的心中都保留著許多對母校、對母校老師們的珍貴的記憶。請允許我代表全體校友，對培養我們的母校和在母校任教的老師們、工作人員們，表達最衷心的敬意和謝意。

今年是母校建校的一百週年大慶。百年來，母校形成了優良的學風和校風，為國家培養了難以計數的高質量的人才，在江蘇，在全國，都稱得上是名校。過去人們祝壽時愛用一句話，叫作“壽比南山不老松”，我謹代表全體校友，祝母校永葆青春，永葆輝煌，在教育科學的高峰上不斷攀登，達到更高、更高的水平，壽比無錫惠山的不老之松。

謝謝大家。

2011年2月5日，無錫。



我和北大中文系 1955 級的 《中國文學史》

1958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本很特殊的書，那就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因為這一屆是 1955 年入學的，所以稱為 1955 級。這一個年級一共四個班，三個屬文學專門化，一個屬語言專門化。書是由文學專門化三個班的四五十個同學寫的。出版後，《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出版工作的新方向》的社論，系主任楊晦教授等撰文論述它的“科學成就”，校長陸平在全國文教群英會上把它作為“不斷革命，徹底改造大學文科”的典型。於是，班級代表不斷在各種會上介紹經驗：北京市學習毛主席著作小組長會議、全國學生第十七屆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會、全國建設社會主義優秀青年代表會議，等等。大概也就在這期間，德國萊比錫舉行國際圖書展覽會，出版社特別出了“豪華本”前去參展，真可謂集一時之盛。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呢？那時，高等學校中盛行“拔白旗，插紅旗”。先是在學生中“拔”，我因為表示過，要“通過學術為社會主義服務”，所以被當作“白專”道路的典型，被狠狠地“拔”過一通。接著是在教授中“拔”，發動學生批判老師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我們年級的任務是批判為我們講授魏、晉、隋唐文學的林庚教授。開始時辦了一份油印刊物，題為《革新》。後來覺得還不過癮，有一次班上開

會，團支部書記黃衍伯同學提出：不破不立。光批判，是破，沒有立，我們自己編一部文學史如何？我那時雖然是“白旗”，但在自己的老師面前，又似乎是“紅旗”了。再加上不知天高地厚，立即表示贊成。有同學顧慮，政治觀點上，我們比老師強；但在藝術分析上，我們不如老師。記得我還曾發言反駁，論證我們在藝術分析上也行。於是，馬上貼出大字報，建議全年級三個班的學生放棄暑假，留校，編一部嶄新的文學史。自然，其他兩個班級熱烈響應。這下子，苦了準備回家探親的同學，不少人還買好了車票。但是，出於政治熱情，大部分人還是留下來了。

接著是分組：先秦組、魏晉南北朝組、隋唐五代組、宋元組、明清組、近代組。我分在隋唐五代組，而且被任命為副組長。大概是認為業務上還行吧？

用什麼觀點統帥全書呢？此前不久，《文藝報》上連載過茅盾的《夜讀偶記》，該文認為一部文學史充滿了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鬥爭。在那個強調“階級鬥爭”的年代，我們自然認為這一觀點很正確，因此，就以之作為編寫的指導思想。接著自然是討論，在唐代文學中，誰是現實主義作家，誰是反現實主義作家。那時，我們每人都有一本油印的唐代作品選，我們就根據讀這個選本的所得印象給作家排隊。很容易，凡是寫民間疾苦的就是現實主義，凡是寫山林隱逸生活或其他內容的就是反現實主義。根據這一標準，現實主義作家有陳子昂、杜甫、前期白居易、元結、顧況、張籍、王建、元稹、李紳、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等；反現實主義作家呢？有王維、孟浩然、後期白居易、韋應物、劉長卿、大曆十才子、韓愈、孟郊、賈島、李賀、李商隱、杜牧等。我分工寫中晚唐文學部分。不過，我從一開始就對這樣的劃分感到懷疑。以中晚唐詩人為例，顧況，因為寫過一篇《囡》，揭露當時福建以兒童作奴隸的悲慘現象，所以被列為現實主義作家，其實，他後來到茅山做了道士，寫了大量隱逸詩；李商隱是被定為反現實主義作家的，

但是，他也寫過大量憂國憂民的詩篇。類似的情況很多。我覺得，將中晚唐詩人截然劃分為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很困難，而且，將李商隱等一批詩人打成“反現實主義”我也無法接受。於是，我將這一問題提到全組面前。組裡要求我辦一個小型展覽，將“現實主義作家”的“反現實主義”作品和“反現實主義”作家的“現實主義”作品一一陳列、標示。這對我並不困難。我喜歡唐詩，主要作家的別集都有，而且，大部分也都讀過，小型展覽很快辦成。令我大感意外，也大感失望的是，我的組員們略一瀏覽，便說，要看主流，看本質，其結果當然是維持原來的劃分不變。

“看主流，看本質”，有時真是一個法寶，它可以讓你在大量鐵的事實面前閉上眼睛，心安理得地去服從一個錯誤的結論。1957年全國範圍內劃右派，我的同班同學中有好幾位都被戴上帽子。其中有一位陳玄榮。原來是福建地下黨，那是要時刻準備丟腦袋的事。1949年後參加解放軍，復員後成了我的同班同學，竟也被劃為右派。我想不通，他怎麼會反黨、反社會主義？便在團支部書記面前舉出他擁護共產黨，聽毛主席的話為例證，但支部書記的一句話，就使我啞口無言了。哪一句話呢？還是“看主流，看本質”。

在一部文學史就是“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鬥爭這一問題上，我的“反抗”失敗了，只好按兩者鬥爭的公式寫。初稿完成了，意想不到的事也發生了——要我去豐臺橋樑廠編工廠史，將初稿交給別人接手。我知道這不是對我的信任，而是對我提出不同意見的酬報。不過，我一直渴望走向生活，去工廠還是很樂意的。

大躍進的年代，什麼都講究快。從倡議編書到完成書稿，不過三十多天；從發稿到出版，不過二十四天。上下兩巨冊。七十七萬餘字。它的前言一開始就批判“資產階級學者”仍然迷戀於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學術思想，頑固地堅守著個人學術的“獨立王國”，繼而宣稱：“我們這些站在黨的紅旗之下的無產階級學術的新兵”，“再不能沉默了”，要“向

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展開不調和的鬥爭，並在這場嚴重鬥爭裡，把自己鍛煉成插紅旗、拔白旗的社會主義科學大軍中堅強的戰士”。由於書皮是紅的，它也就此被譽為“紅色文學史”，出現了本文開頭所寫的報刊捧、專家抬、領導表揚的狀況。

“世事茫茫難自料。”時間到了1959年。政治氣候有了變化，學術氣候也因之變化。大家覺得，現實主義、反現實主義鬥爭的公式太“左”、太簡單，於是，醞釀修改。這時，我的“反抗”被人們想起了。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文革”中自殺）在一次會上說：那時有的同學不同意說李商隱是反現實主義詩人，雖然有道理，但不要驕傲，云云。其他似乎還說了什麼，通通忘記了。此後，便以“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投入再修改。這次共用了五個月時間，於當年10月出版，作為對國慶十週年的獻禮。和“紅色文學史”比較起來，這一版書的觀點比過去平穩，篇幅從兩巨冊變為四巨冊，封面也由紅色改為黃色。

50年代末，政治氣候變化得特別快。短暫的反“左”之後便是強烈的反右傾，黃皮本文學史似乎被認為右傾。校領導承認：“又有某些批判不夠之處。”上面派人來檢查、總結。我被叫去談話，某領導（後來成了大領導）問我：李商隱這種給妓女寫詩的作家有什麼可以肯定的？我能說什麼呢？當時，我還不知道毛澤東很喜歡“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詩，覺得在這位領導面前說不清，道不明，所以便無言。

這時，已經是1960年上半年，快畢業了，但是，我們還是對黃皮本文學史再次進行修改，其精神自然是“加強批判”。後來曾經將重寫的部分章節合在一起，作為內部資料在小範圍內印行，不過，它始終沒有公開出版。我曾設法找到了一本。

畢業前後

——北大雜憶之一

留校，我想也不敢想

快畢業了。會分配到哪兒去呢？

系裡下達了分派計劃，要每個人填一張志願表。北大，要留下十多名，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要五六名，文學研究所要十多名，其他如中央機關要若干名，還有外地各學校、北京各學校之類。我該怎樣填呢！

論學業，我可能算是好學生。我這個人別無他長，對付考試似乎頗有辦法。小學升中學，初中升高中，成績都很突出。1955年考進北大中文系後，系裡要挑成績好的學生去輔導外國留學生，我是被選中的“總負責人”。進大學的最初兩年，學校模仿蘇聯，口試，我門門都是5分。記得第一學期結束考四門，最後一門是李世繁老師的邏輯。李老師在我的成績冊上填上“5”字之後，審視我前三門的成績，說了一句：“啊！你是全優生呀！”進入三年級之後，搞教育革命，學生批老師，自己編書，基本上不考試了，不過，在人們的心目中，我的業務還是不錯的。圖書館有位老館員，因為我常去借閱別人從來不借的書，和我熟悉了，有一次極有信心地對我說：“我看得出來，你肯定留校！”

“留校！”我想也不敢想。

畢業鑒定時算總賬

“我們都是滿懷著幻想和希望走進北大的。”這是我入學後在年級大會講話時的頭一句。

年輕人愛幻想，學文學的人，自然幻想更多。我總覺得，人的一生，應該為祖國、為人民做點什麼，不應該碌碌無為。進入大學不久，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這自然很合我的胃口，於是發奮讀書：《別林斯基選集》《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杜勃羅留波夫選集》，一本本地讀；《詩經》《楚辭》《漢魏百三名家集》《李太白集》《杜少陵集》，一部部地啃。一次，我和班裡的團支部書記黃衍伯同學談心，介紹自己的經歷：“在中學時，當過共青團幹部，那個時候，覺得一輩子留在中學裡，做人的工作也很有意思；現在進大學了，今後要通過學術為社會主義服務了。”不想，這個表白後來卻成了我走“白專”道路的根據。畢業鑒定云：“標榜通過學術為社會主義服務，拒絕思想改造。”其實，我的原意只是想說明自己在“為社會主義服務”途徑上的一種選擇，並無任何“拒絕思想改造”的意思。作為國家培養的“專業”人才，不通過自己的“專業”為國家效勞，通過啥？

1957年，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號召鳴放，幫助黨整風，我覺得主席真是英明極了。班上的鳴放會，我只發了一次言，說的是中學畢業，選拔留蘇學生時，過分重視社會關係，有的人，各方面都優秀，可以批准參加共產黨，但是，卻因為社會關係上有點“問題”，不能派到蘇聯去留學，甚至也不能進東方語言系這樣的涉外學科讀書。我覺得過於機械，不利於培養人才。以後，班上開了多次會，我就再也沒有說什麼。黨支部書記于民同學動員我，問我為什麼不講話。我說：“我對黨沒有意見。”我這樣說，並不是已經預見到了“引蛇出洞”一類的“陰謀”或“陽謀”，而是我確實沒有更多意見。那時，我才二十歲出頭，涉世不深，所有的感覺都是真心誠意的。後來，發生了西語系的二十九

人事事件。當時，正值大鳴大放時期，北大學生貼出了許多幫助黨整風的大字報。某日，北京各高校正在清華大學舉行運動會，北大西語系有二十九個學生跑到那裡去，號召大家到北大來看大字報。當天，就有另一批人貼出大字報，嚴厲指責二十九人去清華是煽風點火的反黨行為。這二十九人隨即貼出大字報自辯，說明其中有共產黨員若干人、共青團員若干人，到清華去沒有什麼不軌目的。說真的，這二十九個人我一個也不認識，只知道領頭者之一叫王克武，是復員軍人，寫詩，他的詩曾被選入中國作協的一本詩選。我覺得，輕易地指責他們反黨沒有根據，會影響整風鳴放，於是，便向同室的同學陳玄榮談了看法，他很同意，即由我起草，貼出一張大字報，其內容大意是：“我們不是二十九人事件的參加者，也不是目擊者，但我們覺得，他們去清華，畢竟是宣傳幫助黨整風，而不是宣傳反對社會主義；他們的效果也許不好，但動機畢竟是善良的。”還有幾句話是：“儘管他們的清華之行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即使別人是阿 Q，也要允許別人革命，何況別人還不一定是阿 Q 呢！”所謂允許阿 Q 革命云云，是從毛澤東的內部講話裡搬來的。那時，北大在學生中傳達過一些毛澤東鼓勵鳴放、批評教條主義的講話，我是完全擁護的，因此，就在大字報裡用上了。大字報貼出後，並沒有什麼特別反應，似乎只有一個人在上面批道：“你們怎麼知道他們的動機是善良的？”

我完全沒有料到，陳玄榮後來竟當作右派被揪出來了。我的這位同學，原是福建地下黨，後來參加解放軍，復員後考進北大。大概因為是地下黨，知道當年內部肅反時的一些慘酷事實，班上的鳴放會，他談道：“蘇聯的肅反擴大化，中國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呢？”另外，他一把年紀了，還和我們這些毛頭小夥子們一起唸書，心裡也許有點不平衡，貼過一張批評軍人復員工作的大字報，於是，就被揪出來了。

對於陳玄榮的被揪，我想不通，他是地下黨、解放軍呀！而且，有天早晨，新聞節目廣播毛澤東接見共青團代表時講的一句話：“一切離